

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

——基于异质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朱宏泉, 陈双燕

(西南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31)

[摘要] 结合中国经济转轨的时代背景,以2008—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并探究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异常审计费用与地区腐败呈U型曲线关系,且这种U型关系具有明显的宏观环境异质性和企业特征异质性,即在十八大召开以前和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以及国有企业和固定资产占比高的企业中更显著。影响机制分析显示,环境不确定性在地区腐败影响异常审计费用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腐败成为阻碍经济车轮前进的“绊脚石”,新时期大力打击腐败势在必行。

[关键词] 地区腐败;异常审计费用;环境不确定性;审计师决策;企业风险评估;审计意见;腐败治理;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 F239.4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3114(2020)01-0001-12

一、引言

腐败是转型时期的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等政策的出台,以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科学决策,使腐败治理进入“新常态”。然而,中国经济层面上企业快速成长的同时却伴随着市场环境中腐败之风盛行^[1]。事实上,这种经济增长与腐败并存的现象普遍存在于东亚国家,被称为“东亚悖论”(East Asia Paradox)。厘清腐败对企业微观运营的影响,是彻底摧毁腐败温床的重要前提。环境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也是企业决策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2]。地区腐败作为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重要体现,会影响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

审计师是企业信息质量的重要把关人,在企业财务报告的鉴证方面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安然事件、乐购事件等一系列公司财务丑闻的曝光,使得公众对审计师的监督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审计师对客户的风险格外关注。由于环境不确定性反映了企业面临的总体风险,因此审计师需要重点加以考察。审计师通常与客户公司进行大量的交流和实地考察,拥有较多的企业私有信息,那么审计师是否能够及时发现企业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决定因素——地区腐败,并作出相应的反应呢?当前很少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鲜有文献从审计视角探讨区域腐败对企业微观行为的影响。本文将从审计师决策角度出发,研究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具体来说,以异常审计费用反映审计师对客户企业的风险评估,考察审计师是否会将地区腐败纳入其风险评估体系,即是否会对地区腐败作出反应以及作出何种反应;进而,基于宏观环境异质性视角和企业特征异质性视角探讨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关系的差

[收稿日期] 2019-05-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773100;91746109);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7XJC790009)

[作者简介] 朱宏泉(1963—),男,四川成都人,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资产定价、金融市场与机构、行为金融;陈双燕(1992—),女,贵州贵阳人,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金融,邮箱:csy_chenshuangyan@163.com.

异,并对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探究。

本文可能存在如下边际贡献:第一,关于腐败的研究,学者们更为关注腐败对企业发展及企业行为的影响,鲜有文献对腐败与审计师决策的关系进行探讨,而本文首次探讨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并厘清两者关系的作用机理,将视角延伸至审计领域,填补了相关研究空白。第二,现有研究多将异常审计费用作为解释变量,少有学者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的研究表明地区腐败会对异常审计费用产生显著影响,能丰富相关研究。第三,本文为解决腐败到底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还是“绊脚石”之争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一定的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

(一)腐败与环境不确定性

关于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还是“绊脚石”的争论持续不断。

持腐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润滑剂”作用的观点的学者认为,腐败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保驾护航,降低了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首先,腐败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关联,在正式制度缺位的转型时期发挥了一定的资源配置功能。通过与政府“疏通关系”,企业在竞争中得到了政府的“特殊照顾”,因而更容易获得政府所提供的各种信贷资源,缓解融资约束,在稀缺资源的获取上也更具优势^[3]。另外,行贿企业通常能够获得更多的政策优惠和政府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负担并减少了外部势力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干扰^[4]。其次,腐败能够使企业避开某些无效率的政府管制,加速官僚程序(red tape)。通过行贿官员,企业“购买”了更高质量的政府服务^[5],以此简化在政府部门办事的繁文缛节,缩短行政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且更易获得市场准入许可^[6]。

持腐败无效论的学者则认为腐败是阻碍经济车轮前进的“绊脚石”,会提高企业风险,增加企业生存和发展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腐败程度会带来较弱的产权保护,无形资产(如专利和商标)的投资收益因其特殊性而更易被政府官员侵犯,这会导致企业减少在无形资产方面的投资,增加对固定资产(如机器和厂房)的投资,从而扭曲企业的资产配置,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和创新^[7]。类似地,在腐败之风盛行的地区,企业家通过贿赂政府官员、挪用公司财富等行为实现个人回报最大化,直接导致企业家才能配置到寻租腐败活动中,而不是企业的生产性活动^[8]。另外,在正式制度不健全时,企业只能通过行贿等非正式制度获得生存机会,这无疑增大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和营业成本,磨损了经济运行的效率^[9]。腐败毕竟是一种非正式制度,政府官员通过收受贿赂而做出的承诺没有相关制度的保障,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10],事后“毁约”或是“敲竹杠”向企业索要更多贿赂的情况屡见不鲜,因而企业的发展将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和更高的风险。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腐败对企业的影响不是绝对的,不是所有的腐败都是有害的,也不是所有的腐败都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高度腐败并存的“双高现象”。学者认为,腐败可能存在最优规模,适当的腐败水平有利于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刺激企业创新,提高企业收益,促进企业发展;但当腐败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将会阻碍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和收益的增加^[1,11]。

此外,腐败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会影响企业管理层的道德选择和日常管理活动。腐败文化盛行的地区,企业管理层的道德观念较淡薄,企业通常使用隐蔽性更强的真实盈余管理方式来掩盖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利益交换^[12],这类企业发生财务欺诈的可能性较高^[13],日后被利益相关者起诉的风险也将增大。总之,以上文献都表明腐败会对企业的发展及管理层的日常管理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总体环境不确定性。

(二)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费用

近年来,在审计实务中时常出现审计师被上市公司牵连的情形,当上市公司因虚假陈述而遭到监管

部门调查时,会计师事务所和签字注册会计师也会被调查。美国“安然事件”中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破产倒闭,我国“万福生科事件”里中磊会计师事务所的证券从业资格被取缔,这些事件标志着国内外资本市场逐步明确了审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活动中的责任,这迫使审计师在审计活动中不仅要考虑企业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还需要额外关注客户企业的风险。审计师面对一项高风险的审计业务时,往往有两种选择:一是放弃审计,规避风险;二是建立审计关系,但要求更多的审计费用作为风险补偿,并付出更多的努力以将风险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因此,审计费用反映了审计师对企业的风险评估。审计费用由正常审计费用和异常审计费用两个部分组成。异常审计费用是指审计师当年实际收取的审计费用与正常费用之间的差额。正常审计费用建立在与客户风险相关的可观察到的审计费用决定因素上,而异常审计费用则是指审计费用形成后可观察到的客户风险相关因素所不能解释的那部分收费^[14]。与实际审计费用相比,异常审计费用剔除了公司规模等因素的影响,能够更好地体现审计师的努力程度及对客户公司的风险评估^[15]。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赖以生存的环境,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对企业生产经营和风险产生显著影响,环境不确定性成为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环境不确定性的根源来自于企业外部环境,它是企业所面临风险的一个综合体现,这种不确定性越大,意味着企业的生产经营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因素^[16]。环境不确定性通过提高客户错报风险、经营风险和舞弊风险进而影响审计师风险评估:首先,当环境不确定性增大时,企业会更加关注外部性,其管理控制系统会更开放,且倾向于设置更多的部门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形势^[17],这会使会计人员难以有效和准确地评估记录企业的经济业务,加大了企业财务报告的错报风险。其次,面对较高的环境不确定性,管理层缺乏全面的信息评估当前形势,难以作出迅速、有效的战略决策,决策失败的风险大大提高^[18],此时为及时反映环境变化对企业的影响,企业需要及时更新预算方案并提高预算制定的频率^[19],这会使企业更倾向于制定短期规划,从而不利于企业的远期规划和发展,这样势必会使企业的经营风险增大。如果因此导致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那么审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被调查的可能性也会提高。最后,较高的环境不确定性导致企业未来的经营业绩难以预测,这会引起企业盈余波动性的增强和持续性的降低,进而引起股价的波动。管理层为避免其战略目标实施、薪酬最大化和职业形象受到不利影响,会有强烈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等机会主义行为^[20],因此管理层的舞弊风险增大。

由以上分析可知,当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较大时,审计师会提高对企业的风险评估水平,并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要求更多的风险补偿,进而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16]。

(三)文献述评

从腐败与环境不确定性的相关文献来看,现有研究表明腐败会对企业的发展及管理层的日常管理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增大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总体环境不确定性。但由于学者对腐败文化的度量标准、所站角度和所处环境等因素不尽相同,他们得出了腐败是经济车轮前进的“绊脚石”和“润滑剂”两种不同的观点。中国的腐败研究应立足于当前经济转轨的背景,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理论假设。从环境不确定性与异常审计费用的相关文献来看,现有研究表明当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较大时,审计师会提高对企业的风险评估水平,并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要求更多的风险补偿,进而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从文献梳理的逻辑来看,环境不确定性可能会在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但当前并未有学者将这三者结合起来研究,这也是本文深入探讨的方向。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前文的分析表明地区腐败会影响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但发挥的是降低环境不确定性的“润滑剂”作用还是增大环境不确定性的“绊脚石”作用目前还没有定论。环境不确定性是企业风险的一个综合

体现,审计师会给予环境不确定性大的企业较高水平的风险评估,并付出更多的努力以将风险降至可接受的水平,进而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那么作为重要的外部监督机制,审计师是否会将诱发企业环境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地区腐败纳入其风险评估体系中呢?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角度,探讨腐败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

失范理论认为制度环境及规则对企业战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采用该理论来论述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失范理论探讨了各类社会经济活动背离当前社会普遍认可的社会规范和准则而带来的后果。在失范环境中,监管机制缺失,个体通常会使用非法手段来达到目的。当贿赂等腐败活动成为获取资源的必要前提时,企业会不断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失范的环境,这使得腐败成为企业生存的先决条件^[21]。在企业层面,一方面,一定程度的腐败建立了特殊的政治关联,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使企业更易获取稀缺资源,得到政府的庇护,在这个阶段,政商关系稳定,企业发展“欣欣向荣”,腐败为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提供稳定宽松的环境,降低了企业生存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腐败的初始阶段,企业管理层和政府官员都会极力粉饰腐败行为,以进一步获取更大利益,此时,腐败不易被监管者及外部审计师发觉。基于腐败对企业环境不确定性的降低作用以及腐败本身的隐蔽性,审计师会低估企业面临的风险,因而收取较少的异常审计费用。从社会层面来看,在失范的经济环境中,腐败使企业和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会阻碍正常市场秩序的建立^[22]。由此可见,腐败在正式制度缺失严重的环境中会对个别参与贿赂等腐败活动的企业发挥了“润滑剂”作用。但是,随着制度的健全,建立公平竞争环境的诉求愈发强烈,国家大力提升腐败治理力度。当腐败程度不断加深进而突破某个临界值时,腐败文化开始泛滥,腐败的隐蔽性逐渐降低,这让腐败当事人更易受到监管和处罚。大批官员落马,不确定因素使得企业的生存环境动荡不安,企业为生存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腐败这种非正式制度不但不能为企业提供保障,反而侵害了企业利益,使其发展受到了更多的外界干扰和打压,生产经营的环境不确定性增大。据此,审计师出于职业敏感性变得更为谨慎,会提高对企业的风险评估,并付出更多的努力以降低审计风险,因而异常审计费用较高。鉴于转型时期中国高度腐败与经济高速增长并存的实际,我们认为,腐败对经济的影响不是绝对的有害或绝对的有利,而是存在一个临界值。当制度薄弱且腐败处在较低水平时,能够发挥推动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作用,但随着制度的健全以及腐败严重程度超过某个临界值,它将会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是非线性的。随着地区腐败程度的提高,异常审计费用呈现U型变化规律。

前文的分析表明,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不是单调的,那么随着宏观环境的变化以及企业特征的变化,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可能不同。本文基于异质性视角,进一步考察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的相关性是否随宏观环境和企业特征异质性的变化而变化。在宏观环境异质性方面,本文检验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影响的制度差异和市场化进程差异,具体包括以下两个问题:(1)十八大前后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2)和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相比,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的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在企业特征异质性方面,本文考察了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影响的产权差异和资产配置差异,具体包括以下两个问题:(1)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是否不同?(2)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在固定资产占比高的企业与固定资产占比低的企业之间是否不同?

腐败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会受到逐渐健全的正式制度的冲击,从而减小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影响,审计师对地区腐败的敏感性也会随之降低。十八大以来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打虎拍蝇雷霆万钧,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先后推行了多项反腐倡廉政策,包括《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计划》等,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逐渐健全和完善市场运行制度。十八大召开之后,寻租腐败行为会受到更多的监督和约束,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a:

假设2a:与十八大前相比,十八大后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更小。

由于各地区在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和国家政策方面存在诸多差异,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表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性。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缺乏健全的法律制度和监督机制,企业管理层的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约束,更易滋生寻租腐败活动;而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通常拥有较高的法治化水平和较为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企业的寻租腐败活动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和约束,腐败对资源配置的阻碍作用减弱。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b:

假设2b: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相比,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更小。

腐败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产权异质性。黎文靖和池勤伟指出,政府在政策优惠、信贷资源、行业准入等方面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存在差别对待^[24]。腐败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产生的影响可能不同,它与企业生产效率之间不是一种单调关系,腐败对私人控股企业的生产率有显著影响,但对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明显^[25]。国有企业吃喝腐败对企业绩效的“绊脚石”效应高于非国有企业^[26]。我国现行体制下,由政府任命的国企高管具有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双重身份,而金字塔式的控制结构又使得政府难以对高管的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由此孕育了国企高管权力过于集中的“一把手”权力文化。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以及所有者缺位的产权特性使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脆弱,权力型管理层更具有利用其职位权力追求私有收益的能力和动机,寻租腐败空间显著增大^[27]。因此,本文提出了假设3a:

假设3a: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地区腐败对国有企业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更显著。

制度包括横向的契约实施和纵向的产权保护两个维度。Claessens和Laeven以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衡量企业间的横向契约实施水平,发现无形资产(如专利和商标)的投资收益因其特殊性而更加难以保护,这会导致企业减少在无形资产方面的投资,增加对固定资产(如机器和厂房)的投资,从而扭曲企业的资产配置^[7]。聂辉华等以腐败程度衡量政府与企业间的纵向产权保护水平,发现与横向的契约实施对企业的影响相反,固定资产比例高的企业对腐败的免疫力更差,这主要是由于固定资产通常是课税和摊派的主要标准,与无形资产相比,固定资产的隐藏更加困难,因而更易成为政府官员侵占和盘剥的主要对象^[25]。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b:

假设3b:与固定资产占比低的企业相比,地区腐败对固定资产占比较高企业的异常审计费用影响更显著。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8—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初始样本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2)剔除了ST、PT类型的公司;(3)剔除相关变量缺失与异常的样本。最终得到12243个有效样本。此外,为消除离群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的连续变量进行了(1%,99%)的缩尾处理。研究使用的财务数据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地区腐败涉及的“腐败案件数”和“公职人员数”分别从《中国检察年鉴》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获取以及从《中国统计年鉴》中手工整理。

(二)变量定义及说明

1. 地区腐败(INCOR)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地区腐败(INCOR)。借鉴聂辉华等的研究^[25],本文采用“每万人公职人员腐败案件立案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地区腐败程度。文献证实,公职人员贪腐渎职的犯罪率这种客观化指标能够较好地衡量地区腐败水平^[28]。较高的腐败水平有可能是因为地方政府治理腐败的力度较小,从而导致该指标可能反映了地方政府的反腐力度。但从犯罪经济学角度来看,惩治力度越大时犯罪率应该越低而非越高^[29]。国内学者分析了腐败程度(各地区腐败水平之和)与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中国清廉指数得分

随着时间的变化趋势,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中国腐败程度与清廉指数得分的变化趋势完全相反^[30]。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该指标反映的是地区腐败水平而非地方政府反腐力度。

2. 异常审计费用(ABFEE)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异常审计费用(ABFEE)。借鉴李明辉、高瑜彬等选取控制变量和设定模型的方法^[14, 31],构建如下审计定价模型:

$$LNFEET = \alpha_0 + \alpha_1 SIZE_t + \alpha_2 CATA_t + \alpha_3 ROA_t + \alpha_4 LOSS_t + \alpha_5 LEV_t + \alpha_6 ARINV_t + \alpha_7 EMPLOY_t + \alpha_8 LIQ_t + \alpha_9 BIG4_t + \alpha_{10} OPIN_t + \alpha_{11} SWITCH_t + \alpha_{12} YEAR_t + \alpha_{13} INDU_t + \varepsilon \quad (1)$$

模型(1)的被解释变量为LNFEET,即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解释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资产流动性CATA、总资产收益率ROA、

表1 变量定义及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异常审计费用	ABFEE	采用审计定价模型(1)估计的残差
	审计费用	LNFEET	审计费用(万元)的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	地区腐败	INCOR	公司注册地所在省份每万人公职人员腐败案件立案数的自然对数
	地区腐败二次项	INCOR ²	地区腐败的二次方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SIZE	年末总资产(百万元)的自然对数
	产权性质	SOE	国有产权的企业取1,否则取0
	资产流动性	CATA	流动资产除以总资产
	总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除以总资产
	亏损	LOSS	本年度亏损取1,否则取0
	财务杠杆	LEV	负债总额除以总资产
	客户业务量	SALE	销售收入(百万元)的自然对数
	财务报表复杂程度	ARINV	应收账款净额加存货净额除以总资产
	业务复杂程度	EMPLOY	员工数目的平方根
	流动比率	LIQ	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
	公司年龄	AGE	公司成立年数的自然对数
	客户诉讼风险	AREA	当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或浙江赋值为1,否则为0
	事务所差异	BIG4	会计师事务所为“国际四大”取值为1,否则为0
审计意见	OPIN	本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取1,否则取0	
事务所变更	SWITCH	本年度事务所发生变更取1,否则取0	
年份变量	YEAR	年份虚拟变量	
行业变量	INDU	行业虚拟变量	

亏损LOSS、财务杠杆LEV、财务报表复杂程度ARINV、业务复杂程度EMPLOY、流动比率LIQ、事务所差异BIG4、审计意见OPIN、事务所变更SWITCH、年份虚拟变量YEAR和行业虚拟变量INDU。对模型(1)进行回归,模型的残差即为异常审计费用,记为ABFEE。

3. 控制变量

其他控制变量还包括客户业务量SALE、公司年龄AGE、客户诉讼风险AREA。

主要变量符号及定义见表1。

(三)检验模型

为检验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本文设立模型(2),其中控制变量的选择参考蔡春等的研究^[32]。需要说明的是,为弱化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自变量地区腐败(INCOR)采用滞后一期的数据。

$$ABFEE_t = \beta_0 + \beta_1 INCOR_{t-1} + \beta_2 INCOR^2_{t-1} + \beta_3 SIZE_{t-1} + \beta_4 ROA_{t-1} + \beta_5 LEV_{t-1} + \beta_6 SALE_{t-1} + \beta_7 ARINV_{t-1} + \beta_8 LIQ_{t-1} + \beta_9 AGE_{t-1} + \beta_{10} AREA_{t-1} + \beta_{11} BIG4_{t-1} + \beta_{12} YEAR_{t-1} + \beta_{13} INDU_{t-1} + \mu \quad (2)$$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偏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ABFEE	12243	0.000	0.399	-0.002	-0.982	1.055
INCOR	12243	3.100	0.344	3.136	2.054	3.750
INCOR ²	12243	9.729	1.997	9.832	4.220	14.064
EUAD	12243	1.209	0.852	1.000	0.195	4.950
SIZE	12243	8.200	1.283	8.074	5.266	11.953
SOE	12243	0.552	0.497	1.000	0.000	1.000
ROA	12243	0.034	0.061	0.031	-0.230	0.220
LEV	12243	0.504	0.219	0.504	0.070	1.223
ARINV	12243	0.270	0.183	0.242	0.005	0.784
SALE	12243	7.562	1.493	7.474	3.298	11.488
LIQ	12243	1.769	1.579	1.334	0.193	10.406
AGE	12243	2.744	0.301	2.773	1.946	3.332
AREA	12243	0.383	0.486	0.000	0.000	1.000
BIG4	12243	0.060	0.238	0.000	0.000	1.000

(一)描述性统计

表2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1)异常审计费用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00和-0.002,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1.055和-0.982,说明不同企业的异常审计费用存在明显差异。(2)地区腐败INCOR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3.100和3.136,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3.750和2.054,说明不同地区腐败程度存在较大差异。(3)事务所差异BIG4的平均值和中位数为0.060与0.000,这表明当前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占

我国审计市场的份额为较小。

(二)回归分析

1. 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

表3报告了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地区腐败一次项 $INCOR$ 与异常审计费用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地区腐败二次项 $INCOR^2$ 与异常审计费用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整体上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收费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即低水平的腐败对企业的发展发挥了降低环境不确定性的“润滑剂”作用,而较高水平的腐败则发挥了增加环境不确定性的“绊脚石”作用。轻度腐败会帮助企业建立稳定的政商关系、缓解融资约束、营造稳定的经营环境,降低企业生存发展的环境不确定性,因而审计师会要求较少的风险补偿。而且,初始阶段的腐败隐蔽性更强,不容易被外部审计师察觉,因此反映审计师对客户风险评估的异常审计费用随之降低。相反,过高的腐败则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成本、扭曲了企业的资产配置、抑制了企业的发展,使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更多的外界干扰和更高的风险。另外,随着腐败程度的提高,其隐蔽性下降,参与腐败活动的主体更易受到监管部门的约束和处罚,这同样也会加剧企业生存和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向审计师传递了危险信号。此时审计师对腐败的警惕性提高,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并要求更大的风险补偿,异常审计费用逐渐提高。从其他控制变量方面来看,资产雄厚、盈利能力强、资产流动性强的企业更能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拥有较强的危机处理能力,审计师对这类企业收取的异常审计费用较少,具体体现为控制变量 $SIZE$ 、 ROA 、 LIQ 与异常审计费用负相关;审计师对偿债压力大、业务复杂程度高以及诉讼风险高的企业会收取更多的异常审计费用,具体表现为控制变量 LEV 、 $SALE$ 、 $AREA$ 与异常审计费用正相关,控制变量的符号基本上符合预期。总之,回归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设1。

为进一步明确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我们根据表3的回归结果计算二次函数的拐点,并将其与地区腐败的分布进行比较。根据回归结果得到,该二次函数的拐点为2.887,该值略小于地区腐败的18%分位数(2.891)。由于模型的几何图形是开口向上的U型曲线,可以判定当前中国大约18%的地区腐败处于较低水平(小于2.887),这类腐败有利于降低企业面临的风险,进而减少审计师收取的异常审计费用;而82%的地区腐败处于较高水平(大于2.887),这类腐败会增加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此时审计师会要求较高的异常审计费用。然而在失范的经济环境中少数轻微程度的地区腐败仅对个别参与贿赂等腐败活动的企业发挥了“润滑剂”作用,却破坏了整个市场正常秩序的建立,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随着正式制度的健全,腐败的“绊脚石”效应愈加凸显,清除腐败刻不容缓。这个结论也与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提出的“夺取压倒性胜利”这一反腐败新目标相契合,当前中国仍需“强高压”、“重遏制”、坚定不移地抑制腐败蔓延势头。

2. 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关系的异质性分析

(1)宏观环境异质性

为检验十八大召开前后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影响的差异,本文将样本划分为十八大前和十八大后两组样本,分组进行回归分析。表4的制度差异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十八大召开之前还是之后,地区腐败一次项 $INCOR$ 均与异常审计费用显著负相关,地区腐败二次项 $INCOR^2$ 均与异常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无论正式制度是否完善,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之间都呈U型关系,这与前文的结论一致。

表3 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回归结果

变量	ABFEE	
	预期符号	系数
$INCOR$	-	-0.410*** (-3.71)
$INCOR^2$	+	0.071*** (3.74)
$SIZE$	-	-0.057*** (-8.66)
ROA	-	-0.303*** (-4.59)
LEV	+	0.021 (0.85)
$ARINV$	-	-0.063*** (-2.61)
$SALE$	+	0.056*** (9.99)
LIQ	-	-0.003 (-1.03)
AGE	+	0.122*** (9.45)
$AREA$	+	0.154*** (18.34)
$BIG4$	+	-0.006 (-0.39)
$YEAR$		YES
$INDU$		YES
Constant	?	0.360** (2.17)
Adj-R ²		0.052
F-statistic		23.230
N		12243

注:括号内为T值;***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下同。

但十八大召开之前,地区腐败一次项和二次项的系数分别为-0.548与0.097,十八大召开之后,地区腐败一次项与二次项的系数分别为-0.334和0.056,这说明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在正式制度缺失更为严重的时期更加显著,正式制度的健全和完善降低了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这也是十八大反腐取得显著成效的一个重要体现。回归结果表明,与十八大前相比,十八大后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更小,假设2a得到支持。

为探讨市场化差异对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相关性的影响,本文以王小鲁等编制的“市场化指数”衡量地区市场化程度,将市场化指数低于样本中位数的定义为市场化程度低组,将市场化指数等于或高于样本中位数的定义为市场化程度高组,分样本对地区腐败和异常审计费用进行回归分析。“市场化指数”涉及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和中介组织与法律等5个一级指标。这套指数测算了各省区市的市场化进程,该指数越大代表市场化程度越高^[33]。表4市场化进程差异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市场化程度低和市场化程度高两组样本中,地区腐败一次项均与异常审计费用显著负相关,地区腐败二次项均与异常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与前文的结论一致。但在系数方面,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竞争机制缺失的低市场化程度样本组中,地区腐败一次项与二次项的系数绝对值均大于市场化程度高组样本的系数绝对值。这说明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相比,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更小,假设2b得到支持。

(2)企业特征异质性

表5是考虑企业产权性质的回归结果。从表5可知,国有企业中地区腐败一次项与异常审计费用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地区腐败二次项与异常审计费用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仍然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但对非国有企业而言,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地区腐败对国有企业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更显著,假设3a得到支持。

为考察企业资产配置特征对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关系的影响,本文将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大于或等于样本中位数的企业划分为固定资产占比高组,将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例低于样本中位数的企业划分为固定资产占比低组,分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固定资产占比高的企业中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回归系数为-0.729,地区腐败二次项与异常审计费用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123,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的U型关系仍然存在。在固定资产占比低的企业中,地区腐败一次项和二次项则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说明较高的固定资产占比会加强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之间U型关系,地区腐败对固定资产占比高的企业异常审计费用影响更大,假设3b得到支持。

(三)进一步讨论:影响机制分析

前文分析指出,地区腐败会影响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异常审计费用。为厘清地区腐

表4 宏观环境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ABFEE			
	制度差异		市场化进程差异	
	十八大前	十八大后	市场化程度低	市场化程度高
INCOR	-0.548*** (-3.29)	-0.334** (-2.24)	-0.516** (-2.51)	-0.472** (-2.46)
INCOR ²	0.097*** (3.40)	0.056** (2.13)	0.086** (2.57)	0.083** (2.36)
SIZE	-0.061*** (-7.04)	-0.050*** (-4.94)	-0.073*** (-7.93)	-0.030*** (-3.25)
ROA	-0.061 (-0.74)	-0.724*** (-6.55)	-0.334*** (-3.69)	-0.280*** (-2.92)
LEV	0.071** (2.32)	-0.048 (-1.14)	0.033 (0.99)	0.007 (0.18)
ARINV	-0.094*** (-2.91)	-0.031 (-0.84)	-0.118*** (-3.35)	-0.048 (-1.42)
SALE	0.057*** (7.74)	0.054*** (6.23)	0.058*** (7.44)	0.050*** (6.28)
LIQ	0.002 (0.41)	-0.007 (-1.57)	0.007 (1.64)	-0.011*** (-2.82)
AGE	0.121*** (6.37)	0.122*** (6.93)	0.156*** (7.67)	0.106*** (6.33)
AREA	0.174*** (15.35)	0.132*** (10.55)	0.192*** (6.15)	0.110*** (8.30)
BIG4	0.058*** (2.75)	-0.093*** (-3.79)	0.059** (2.11)	-0.052*** (-2.65)
YEAR	YES	YES	YES	YES
INDU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538** (2.16)	0.252 (1.12)	0.505 (1.56)	0.352 (1.36)
Adj-R ²	0.064	0.047	0.041	0.044
F-statistic	18.330	12.030	9.831	10.480
N	6821	5422	6084	6159

败影响异常审计费用的作用机制,本文进一步检验环境不确定性在地区腐败影响异常审计费用的过程中是否发挥中介效应。沿用申慧慧等的方法^[20],采用OLS对模型(3)进行回归:

$$SALE = \omega_0 + \omega_1 YEAR + \varepsilon \tag{3}$$

其中,SALE为营业收入;YEAR为年度变量,当观测值是过去第4年至当前年度时,YEAR取1~5。将回归得到的残差作为非正常收入,计算公司过去5年非正常收入的标准差,再除以过去5年销售收入的均值,得到未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最后,将各公司年度未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除以同一行业内所有公司未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的中位数,即为公司本年度的环境不确定性(EUAD)。参考Baron和Kenny的方法^[34],本文使用分步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1)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是否具有显著影响;(2)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是否具有显著影响;(3)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纳入回归模型检验二者对因变量的影响。若第一步自变量系数显著,第二步自变量系数、第三步中介变量和自变量系数均显著,则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第二步自变量系数显著,第三步中介变量系数显著而自变量系数不显著,则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在本文中,分步具体表现为:(1)检验地区腐败是否会对异常审计费用产生显著影响;(2)检验地区腐败对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是否显著;(3)将环境不确定性和地区腐败同时纳入模型对异常审计费用进行回归分析。

对于第一步检验,前文已证实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存在显著影响(表3),第二步和第三步检验结果见表6。表6的列(1)显示,自变量地区腐败与中介变量环境不确定性显著相关,且地区腐败一次项INCOR与环境不确定性显著负相关,地区腐败二次项INCOR²与环境不确定性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地区腐败与环境不确定性

之间也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较低水平的腐败有利于企业获取稀缺资源,营造稳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降低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而当地区腐败高过一定水平则会加大企业生存成本,增大企业生存和发展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列(2)显示中介变量环境不确定性与因变量异常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最后在回归模型(2)同时加入中介变量和自变量对因变量进行回归时,地区腐败一次项INCOR与异常审计费用显著负相关,地区腐败二次项INCOR²与异常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这与前文的结论一致。根据分步法中介效应检验原理可知:第一步检验中自变量地区腐败与因变量异常审计费用显著相关,第二步检验中自变量地区腐败对中介变量环境不确定性有显著影响,第三步检验中中介变量环境不确定性与自变量地区腐败对因变量异常审计收费的影响均显著。结果表明,环境不确定性在地区腐败影响异常审计费用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地区腐败会通过影响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异常审计费用。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加可靠和稳健,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测试(具体结果未列示,备案):

第一,更换指标。使用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和审计费用占总资产的比例代替异常审计费用衡量审计

表5 企业特征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ABFEE			
	产权性质差异		资产配置差异	
	国有	非国有	固定资产占比高	固定资产占比低
INCOR	-0.731*** (-4.91)	0.056 (0.34)	-0.729*** (-4.31)	-0.206 (-1.38)
INCOR ²	0.116*** (4.50)	0.000 (0.01)	0.123*** (4.29)	0.036 (1.37)
SIZE	-0.056*** (-5.97)	-0.056*** (-6.12)	-0.055*** (-5.30)	-0.051*** (-5.70)
ROA	-0.546*** (-5.51)	-0.202** (-2.32)	-0.172* (-1.90)	-0.577*** (-5.84)
LEV	-0.018 (-0.50)	0.035 (1.08)	0.070** (2.05)	0.009 (0.25)
ARINV	-0.086** (-2.44)	-0.046 (-1.39)	0.123** (2.44)	-0.215*** (-6.70)
SALE	0.078*** (9.58)	0.043*** (5.64)	0.049*** (5.41)	0.060*** (8.23)
LIQ	-0.000 (-0.02)	-0.008** (-2.28)	0.010** (1.99)	-0.014*** (-3.58)
AGE	0.161*** (7.41)	0.122*** (7.61)	0.113*** (6.01)	0.134*** (7.51)
AREA	0.145*** (11.66)	0.121*** (10.59)	0.161*** (13.28)	0.135*** (11.42)
BIG4	-0.038* (-1.96)	0.054* (1.78)	0.027 (1.22)	-0.049** (-2.10)
YEAR	YES	YES	YES	YES
INDU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692*** (3.10)	-0.299 (-1.21)	0.826*** (3.13)	0.051 (0.23)
Adj-R ²	0.088	0.049	0.057	0.063
F-statistic	22.630	10.450	13.270	14.630
N	6759	5484	6121	6122

师对企业风险的评估,结论不变。本文以王小鲁等编制的“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排名来衡量地区腐败水平。“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包含中介组织的发育、对生产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知识产权保护 and 消费者权益保护4个一级指数,具体细分为律师人数与当地人口的比例、注册会计师人数与当地人口的比例、市场秩序、执法效率、三种专利申请受理数量与科技人员数的比例、三种专利批准数量与科技人员数的比例、消费市场秩序、对消费者保护的程度8个二级指数。对各省份的每个指数进行评分,最后合成“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该指数越大代表法治水平越高^[33]。将每年各省份“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评分降序排列得到自变量地区腐败的替代变量,排名越小说明“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评分越高,地区市场中介的发育越成熟,法律制度越健全,法治环境越清廉,腐败水平越低。更改自变量地区腐败的度量方法后重复前文的实证分析,发现异常审计费用与“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数”评分衡量的地区腐败程度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前文的结论仍然稳健。

第二,改变样本期间。考虑到2008年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冲击,将2008年的样本从总样本中剔除,重复前文的实证分析,结论不变。

第三,改变回归方法。为降低极端值的影响,使结果更加稳健,使用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代替前文的OLS分析,得到的结果与前文一致。在影响机制分析部分采用SPSS加载宏MEDCURVE进行非线性中介效应分析,实证结论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第四,完善模型。为降低模型(2)中地区腐败指数一次项与二次项的高度相关性,本文对地区腐败一次项减去均值进行中心化处理,之后再平方得到地区腐败二次项,以此对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与前文一致。

表6 环境不确定性的中介效应分析

变量	(1)	(2)
	<i>EUAD</i>	<i>ABFEE</i>
<i>EUAD</i>		0.026*** (6.09)
<i>INCOR</i>	-0.554** (-2.35)	-0.396*** (-3.58)
<i>INCOR</i> ²	0.090** (2.22)	0.069*** (3.62)
<i>SIZE</i>	0.141*** (10.03)	-0.061*** (-9.19)
<i>ROA</i>	2.669*** (18.98)	-0.372*** (-5.56)
<i>LEV</i>	0.787*** (15.05)	0.000 (0.02)
<i>ARINV</i>	0.152*** (2.93)	-0.067*** (-2.78)
<i>SALE</i>	-0.149*** (-12.50)	0.060*** (10.63)
<i>LIQ</i>	0.028*** (4.33)	-0.004 (-1.27)
<i>AGE</i>	0.013 (0.49)	0.122*** (9.44)
<i>AREA</i>	-0.062*** (-3.44)	0.156*** (18.55)
<i>BIG4</i>	-0.201*** (-5.89)	-0.001 (-0.06)
<i>YEAR</i>	YES	YES
<i>INDU</i>	YES	YES
<i>Constant</i>	1.367*** (3.86)	0.325* (1.96)
Adj-R ²	0.053	0.055
F-statistic	23.760	23.750
N	12243	12243

六、结论性评述

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存在高速增长与高度腐败并存的“双高现象”,由于缺乏健全的市场竞争机制,腐败成为资源配置的特殊机制。本文以2008—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审计师决策角度出发,研究地区腐败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并探讨两者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异常审计费用与地区腐败之间呈U型关系,即地区腐败在一定范围内时,异常审计费用随腐败程度提高而降低,而当地区腐败高于一定水平时,异常审计费用随腐败程度提高而增加。(2)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之间的U型关系在十八大召开以前和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以及国有企业和固定资产占比高的企业中更显著。(3)环境不确定性在地区腐败影响异常审计费用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表明审计师的决策会受到企业所在地腐败程度的影响,审计师会将地区腐败纳入其客户风险评估体系。

本文意义主要在于两方面:首先,对个别参与贿赂等腐败活动的企业而言,较低水平的腐败发挥了“润滑剂”作用,降低了企业面临的风险,这很好地揭示了中国腐败之风盛行的根源。相反,高水平的腐败则增加了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是企业发展车轮前进的“绊脚石”,且对整个社会来说,无论程度高低,腐败都会阻碍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不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因此新时期应更加坚定地进行反腐败斗争,加快市场化进程,建立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抑制腐败的继续生长。其次,从审计师方面来看,腐败的隐蔽性容易造成审计师对企业风险的低估,这就要求审计师在风险识别方面具有更强的能力,审计师在

实务中应加强对企业隐性风险的关注,避免低估企业风险。

在本文的作用机制分析部分,我们发现环境不确定性在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的关系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这说明可能还存在其他中介变量对二者的关系造成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地区腐败影响异常审计费用的其他路径,以更全面理解两者之间的联系。

参考文献:

- [1] 赵颖. 腐败与企业成长:中国的经验证据[J]. 经济学动态, 2015(7):35-49.
- [2] 袁建国, 程晨, 后青松. 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管理评论, 2015(10):60-69.
- [3] Wang Y, You J. Corruption and firm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2, 23(2):415-433.
- [4] Lui F T. An equilibrium queuing model of briber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5, 93(4):760-781.
- [5] Cai H B, Fang H, Xu L C. Eat, drink, firms, government: A investigation of corruption from the entertainment and travel costs of Chinese firms [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11, 54(1):55-78.
- [6] Dreher A, Gassebner M. Greasing the wheels? The impact of regulations and corruption on firm entry[J]. Public Choice, 2013, 155(3-4):413-432.
- [7] Claessens S, Laeven L. Financial development, property rights, and growth[J]. Journal of Finance, 2003, 58(6):2401-2436.
- [8] Acemoglu D, Verdier T. Property rights, corrup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A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98, 108(9):1381-403.
- [9] Ahlin C, Bose P. Bribery, inefficiency and bureaucratic dela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 2007, 84(1):465-86.
- [10] Rodriguez P, Siegel D S, Hillman A, et al. Three lenses on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Politics, corruption,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6, 37(6):733-746.
- [11] 高扬志, 冉茂盛. 民营企业腐败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中国管理科学, 2017(3):39-48.
- [12] 张伟倩, 方军雄. 地区腐败与企业盈余管理方式选择[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7(9):115-124.
- [13] Graham J R, Harvey C R, Popadak J A, et al. Corporate culture: Evidence from the field[R]. NBER Working Papers, 2017.
- [14] 李明辉, 沈真真. 异常收费与审计质量: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J]. 管理工程学报, 2016(2):166-174.
- [15] Mitra S, Deis D R, Hossain M.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udit fees and reported earnings quality in pre- and post-Sarbanes-Oxley regimes[J]. Review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2009, 8(3):232-252.
- [16] 申慧慧, 吴联生, 肖泽忠. 环境不确定性与审计意见:基于股权结构的考察[J]. 会计研究, 2010(12):57-64.
- [17] Chenhall R H.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s design within its organizational context: Findings from contingency-based research and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003, 28(2-3):127-168.
- [18] 牛建波, 赵静. 信息成本、环境不确定性与独立董事溢价[J]. 南开管理评论, 2012(2):70-80.
- [19] Sharma D S. The differential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dimensionality, size, and structure on budget system characteristics in hotels [J].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2002, 13(1):101-130.
- [20] 申慧慧. 环境不确定性对盈余管理的影响[J]. 审计研究, 2010(1):91-98.
- [21] Martin K C J, Johnson J, Parboteeah K. Deciding to bribe: A cross-level analysis of firm and home country influences on bribery activit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50(6):1401-1422.
- [22] Leff N H.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bureaucratic corruption[J].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64, 8(3):8-14.
- [23] Jong G D, Tu P A, Ees H V. Which entrepreneurs bribe and what do they get from it? Exploratory evidence from Vietnam[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2, 36(2):323-345.
- [24] 黎文靖, 池勤伟. 高管职务消费对企业业绩影响机理研究——基于产权性质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4):122-134.
- [25] 聂辉华, 张弢, 江艇. 中国地区腐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 中国软科学, 2014(5):37-48.
- [26] 罗付岩.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提高了企业绩效吗——基于内部控制、“舌尖上的腐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7(10):19-31.
- [27] 徐细雄, 刘星. 放权改革、薪酬管制与企业高管腐败[J]. 管理世界, 2013(3):119-132.
- [28] Fisman R, Svensson J. Are corruption and taxation really harmful to growth? Firm level evidenc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1, 64(3):411-427.

- 2007, 83(1):63 – 75.
- [29] Hope C, Mogan H N. A time-series analysis of crime, deterrence, and drug abuse in New York ci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90(3):584 – 604.
- [30] 李后建, 张宗益. 地方官员任期、腐败与企业研发投入[J]. 科学学研究, 2014(5):744 – 757.
- [31] 高瑜彬, 廖芬, 刘志洋. 异常审计费用与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有效性——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J]. 审计研究, 2017(4):81 – 88.
- [32] 蔡春, 谢柳芳, 马可哪呐. 高管审计背景、盈余管理与异常审计收费[J]. 会计研究, 2015(3):72 – 78.
- [33] 王小鲁, 樊纲, 余静文. 中国市场化指数.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34] 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6):1173 – 1182.

[责任编辑:黄 燕]

Regional Corruption and Abnormal Audit Fe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Heterogeneity Perspective

ZHU Hongquan, CHEN Shuangy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this paper, taking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s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from 2008 to 2016 as samples, studies the impact of regional corruption on abnormal audit fees,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effect mechanism between regional corruption and abnormal audit fe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U-shaped cur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corruption and abnormal audit fees. And this type of U-shaped relationship has obvious macro-environmental heterogeneity and firm-characteristic heterogeneity, namely, it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period befor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held and in areas with lower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as well a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with a high proportion of fixed assets. Analyses of the effect mechanism show that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plays a partial mediation role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corruption affecting abnormal audit fee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on the whole, corruption has played a "stumbling block" role in hinder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vigorous anti-corruption is still imperative in the new period.

Key Words: regional corruption; abnormal audit fees;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uditor's decision; enterprise's risk appraisal; audit opinion; corruption governance; resource allocation